

随 笔 体



重返“沪港双城记”

——关于“都市与文化”的一次对话 / 李欧梵 罗岗 倪文尖

【摘要】《上海摩登》从1999年出版的英文版,到2000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再到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至今差不多有十五、六年的历史。毫无疑问,这本书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都非常大,我们完全可以从学术史、研究史的角度来讨论这本书,但从个人的感受来谈《上海摩登》,也许更能触摸到被学术史或研究史忽略的某些更鲜活的记忆。

童老师所谓的“千字文”

——《木铎千里 童心永在——童庆炳先生追思录》后记 / 赵勇

【摘要】“木铎千里”用之于童老师,我觉得他是担得起这一称谓的,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首先,在所有的身份中,童老师把“教师”看得最重,在所有的活动中,他又把“上课”看得最为神圣,最是幸福。“夫童心者,真心也。”或“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在专业领域,童老师曾对“童心说”做过详细解读,在现实世界,“童心说”所论则是童老师追求的境界,也该是他人格魅力的重要支点。这个书名朴实无华,又义涵丰富,实在是太好了。

美与爱浓缩的清明上河图

——读斯特林堡《海姆素岛居民》/ 阎连科

【摘要】读的是《海姆素岛居民》,留存永远的是“海姆素岛上的居民们”。渴望着那样的生活,渴望着那样的文学;也渴望有一天可以返回那样已经被我们忘记的实实在在的写作。

重返“沪港双城记”

——关于“都市与文化”的一次对话

李欧梵 罗岗 倪文尖

时间:2015年4月4日下午14:00

地点:上海思南公馆“思南文学之家”

城市的“鬼魂”与“幽灵”

罗岗:我们认识李欧梵先生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那时还在读研究生。李先生第一次来华东师大还引起了一点风波,本来要发表演讲,最后却没有演讲,个中曲折,李先生的书中也有交代,感兴

趣的可以找他的书来看。那时候李先生来上海,最感兴趣的就是这座城市背后的故事,有一次我和文尖去虹桥机场接他,在车上一路过来,李先生看到上海正在经历“三年大变样”式的“巨变”,他觉得一方面上海的城市面貌变化非常快,另一方面上海的历史可能要在“巨变”中丢失了。于是,李先生说要给上海“招魂”,因为上海的每一个地方都似乎有幽灵,有故事,他想招回来。那时李先生正在准备写《上海摩登》。这本书不仅仅在上海研究

甚至在新文化史研究中,都是一部典范性的作品,李先生为这本书做了多年的准备,我还陪李先生去过上海城市历史纪念馆收集资料。如果说1990年代开始,李先生是有意识地为这本书收集资料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无形地、无意识地为《上海摩登》的写作做准备早就开始了,等一会儿可以请李先生自己讲讲他是怎样来上海复旦大学,与贾植芳先生,特别是与施蛰存先生相遇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和《上海摩登》有关。这本1999年哈佛大学出的英文版,李先生其实酝酿了多年,最终结出硕果。

在和李先生接触的过程中,我个人从他那儿也受到很多的教益。当时我们读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路基本上还限制在文学和文学史的范畴内,听李先生谈《上海摩登》的研究构想,我们才体会文学可以和文学以外更广泛的领域联系起来,譬如城市研究、文化研究等方面就是这样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

《上海摩登》从1999年出版的英文版,到2000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再到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大陆简体字版,至今差不多有十五六年的历史。毫无疑问,这本书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都非常大,我们完全可以从学术史、研究史的角度来讨论这本书,但我想,从个人的感受来谈《上海摩登》,也许更能触摸到被学术史或研究史忽略的某些更鲜活的记忆。

李欧梵:罗岗讲的故事很多我自己都忘了,所以我担心上海会遗忘自己的过去。我自己的过去就遗忘了很多,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上海,我觉得以前研究的上海和以前和罗岗、文尖两位见面,还有和王晓明老师见面,那段时光都像梦一样的。从梦里面醒来,发现这是一个新的上海,一个新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摩登》写完之后虽然很多人看了,但是我完全不管。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在上海很多年轻人都在看,不少读者还是“小资”,不光是大学生。感谢各位上海同行,在上课的时候也用这本书做教材、做参考书。不过说实话,我记得当时写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本书会有什么影响,我为什么这么写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以前念外文系,所以我想找到中国艺术上、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源泉。当时听说有一位“新感觉派”的大师施蛰存先生住

在上海,我就想去拜访他。在上海见过施先生好几次,然后开始收集资料,研究扩展到刘呐鸥、穆时英这些人,一头栽到两个地方,一个是上海图书馆,一个是上海作协图书馆。我在作协的时候认识很多人,现在很多当年的朋友都去世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才发现,其实我也是迷迷糊糊从文学研究进入到都市文化研究。据我所知,在八十年代初期,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都市文化研究。

我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因为我发现研究新感觉派也好现代主义也好,它和现代都市和都市文化是分不开的,当时我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感觉到这段文学史的基调好像是以农村为主、以革命为主、以社会改革为主,可是我觉得上海有一点独特性,至少我的书是这么写的,这就是所谓“上海摩登”。我心目中的“摩登上海”——连“摩登”这个词都是上海人翻译过来的——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有国际视野的大都市文化,我认为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这次来,一方面回顾这本书的不足,一方面来跟各位讨论一下,我对于现在上海的理解是怎么样。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私人意愿,不知道为什么,我本来想跟我太太到欧洲去玩,刚好碰到威尼斯大学建筑系开一个会,是专门讨论上海的,主题叫“一个城市的反省”,每年以不同的城市来反省,这年的主题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反省,让我去做一个主题演讲。我想我到70岁,大家都不让我写论文了,让我做一个主题演讲就可以了,主题演讲有一个好处,不必写论文,随便吹牛,吹完就走。我怎么写?就指定一个题目,现在的上海和三十年之前的上海发展有什么不同。这个题目应该是上海的朋友来为我来讲的,因为我没有资格代表上海,我又不是上海人。我因为研究上海才和上海包括上海学界结缘的。所以怎么样切入这个问题,是我很关心的。

《上海摩登》最后一章提到,一个偶然的机,外滩的汇丰银行大厦要重新装修,在粉饰墙壁时将原来表面的涂层铲去,发现下面隐藏着一幅很大的壁画,上面绘有伦敦、也有上海。原来上海有这么辉煌的历史。我看了非常高兴,我说上海总算发现过去的历史了:这个历史是在我1981年左右来上海的时候,慢慢才被发现的,这个历史是国际性的历史,不是城隍庙的老上海,写怎么从扬州变到上海后来就有国外的教授写了,有伯克莱的几

位教授,都开始研究上海,还有上海的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的各位同行也开始不约而同地关注上海的文化文学。

我年龄大了,知识也落后了,这本书真的有点过时了,我也没有心情再改写,就只把这本书当成一种半过时的文本,做一个批判性的阅读和研究吧。书里面我发现有很多欠缺,最大的一个欠缺,我当时就知道是建筑,可不知道从何着手。我现在对建筑非常着迷,我认识一位建筑师朋友,每次来都找他带我去看。我研究都市文化时,只知道重绘上海的地图,怎么把上海当时的文化展示出来,并没有想到时间和空间关系,没有写视觉和建筑的关系。一个大城市的规划有时是偶然产生的,我没有考虑到文化的底蕴和都市的建筑之间,更没有思考到发展主义和原来的历史文化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后来都变成全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研究都市文化的主要题目。21世纪挂帅的已经不是我们当年那种老式文化史的做法,而是建筑史理论。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从同济大学来的?同济大学几位老师和学生,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大的贡献。上海在西方的眼光里,真的变成了“执牛耳”、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大都市,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很多人都到上海来。

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城市面貌、潜在力量和文化资源,甚至在全球资本主义影响下,它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都变成全世界研究建筑、研究文化史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但这些大问题已经不属于我的。当时我来上海时,觉得上海是属于我的,在美国没有人研究上海的文化,他们都在研究这座城市的其他的方面,如有人研究上海的烟草公司,也有人研究上海的金融,还有人研究上海的警察……可是对于当时上海的文化,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大光明戏院在哪里?国际饭店有多少层楼?我还问过,你如果在大光明看电影,楼上楼下的票价多少……当时这些都市文化、消费和文学作品的互动问题,几乎没有人关心,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不知道有多少研究上海文学的人把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

另外一个我非常关心的问题,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了,这也是罗岗很在行的,就是视觉文化。上个学期我和以前的一个学生张历君在香港合开一门课《书写文化和视觉文化》,上课时我

说糟糕了,《上海摩登》里面又缺了一样,那就是视觉和建筑的关系,这个没有讲,只在一章里面讲了上海的电影和上海的观众。现在大家如果再看一看上海,也可以发现建筑与视觉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和我个人的经验有关。我第一次到上海,住在锦江饭店,第二天到巴金先生家里拜访他,之后就一直住在锦江饭店,没事一个人摇晃着,从锦江饭店一路走到外滩,当时感觉上海笼罩在一个没有灯的世界里,古旧的建筑里有鬼影、有阴影,还有情侣的情影不断闪现——当时情侣没有地方去,我一路上看到不少情侣的影子躲在大柱子后面讲话——一路走到外滩,外滩也没有多少人。感觉整个城市就像是一个鬼城,我开始觉得自己对这座城市着了迷,正是因为有那种“鬼影”和“幽灵”,所以我也像“幽灵”一样转来转去就转入了这座城市中。一个有文化的都市你会时时感受到历史的幽灵,即使它变成了一个新的城市,也可以借助“幽灵”和“鬼魂”的重返,把它的历史重新创造出来,拍电影是一种创造,做研究何尝不是另一种创造?目的都是为了重新建立、重新创制、重新展示一个不一样的、被人们长期忽略的上海。当上海作为一种历史的资源可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时,我就开始着了魔。

我基本上就是这么一路写下来,现在发现上海变成一个光辉灿烂的城市,虽然到了虹桥机场飞机降落时,发现光线不够亮,至少没有香港那么亮,但晚上也是五光十色。现在上海的夜晚交织着各种灯光,各种媒介、各种多元性视觉文化的影响都呈现出来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发现上海在灯光灿烂之下还保留了很多老建筑。有些灯光是经过特别设计,我晚上去看时,这个楼是什么楼?字虽然看不清楚,但表明历史建筑都保留下来了,都注明了是哪一年盖的,比如说外白渡桥是1907年修建的,英国领事馆又是哪一年建造的,都有历史。这就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以前的鬼魂似乎少了,但建筑物作为实体还在那儿,每一个建筑物都统治着附近的空间,那些道路是因为建筑物而存在。昨天我的那位建筑师朋友带我和我太太去看圆明园路,外滩源那里,我才第一次听到,原来有这么一个新的规划叫“洛克外滩源”。这个故事本身就不讲了,你们都知道。每一个建筑物在微雨的早上看上去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人很少,和八十年代初我来上海的景象很类似,好像进入到历史的迷宫里面,表面上看非常豪华,进去消费都是我们付不起的,但进到里面的感受,还似乎是人和历史在交谈。

这是在上海独有的感觉,这种感觉——很不好意思说——在香港几乎完全消失了。我非常喜欢香港,可是我想捕捉上海式的感觉,香港却没有。在香港,旧的东西几乎全部拆掉了,我对新一代大楼没有什么兴趣,也许是个人的偏见,我相当讨厌金茂大厦,曾经在一个学术讨论上专门批评金茂大厦,批评得体无完肤,当然会有人不同意。但这里面确实牵涉到一个品位的问题,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我追求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做这种对比?归结起来一个问题,一个城市如果有文化底蕴的话,这个文化底蕴是什么?在急剧发展的全球化社会里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什么叫作全球化都市?现在大家都在理论上大谈全球化问题,那么上海和当时壁画上几个国际大城市进行比较的话,上海的城市特色是什么?也有人说我现在不应该问这些问题了,因为有种建筑理论人文,将来急剧发展的都市,城市面貌上都差不多,建筑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建筑师甚至认为21世纪的超级现代建筑就是地标式的,非常雄伟,非常独特,就像CCTV大楼那样,以此作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了。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未来的建筑文化是什么?这种超级城市和超级建筑现象是不是值得大家讨论的?或者反过来说有的城市乱七八糟,可里面充满了文化的底蕴,充满了“鬼影”式文化,我第一次到伊斯坦布尔就是这样的感受,当地人介绍这是当年东罗马帝国的什么什么东西,那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什么什么东西,讲得头头是道。我有几十年没有去伊斯坦布尔了,不知道了现在怎样,也可能和上海一样,也可能不一样。

全球化进程中都市营造和发展各有不同的类型,上海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到威尼斯时,他们一定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也希望他们请到上海同行去,这样就可以让上海的同行解答,我就不回答了。我在威尼斯的演讲,想把上海的历史文化和威尼斯、维也纳和布拉格这三座我最喜欢的城市——伦敦、纽约也不提了,有很多人做研究——或者用什么办法再加上香港,一共五个城市,来做一个比较,这是我一个基本构思,算是对

《上海摩登》的反思与总结。

二、《上海摩登》前生与今世,正面和反面

倪文尖:李先生70岁,大家都看不出来,讲得非常有意思,我还有点跟不上你的思路,讲到很先进的建筑理论,讲到上海这些年新的变化……你不仅仅向我们,也是向诸位上海的读者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关于上海多样的“时间”的问题:既有今天的上海,又有你1981年第一次来的差不多三十多前的上海,还有你提到的上海的建筑差不多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你的《上海摩登》这本书英文版、中文版出版也快二十年了……在这样一个特别突出了建筑的重要性时间坐标里,如何来理解上海?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想先还是拉回到第一次见你,那是在1986年,你已经完成了《铁屋中的呐喊》,在华东师大讲鲁迅,我当时读大二。后来和李先生熟悉起来,你说可能有一个比做鲁迅还有意思的研究,就是指《上海摩登》吧?你还记得吗?那时也有一个时间坐标,就是《张爱玲散文全编》刚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我把这本书送给你,你又把《铁屋中的呐喊》送给我。

那时的上海研究,也不是完全没有,但确实很少从新文化史的维度上来研究上海。我想您写《上海摩登》时可能也没有预测到,这本学术书也会成为“小资读本”。如果要评选一本最近20年能够在大众阅读和学术界都有非常大影响的书籍,《上海摩登》可以说当之无愧。而且我也很坦率地讲,罗岗一上来开场白讲得很客气,我也说句实话,假如平时李先生不在场,罗岗会说这本书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对学术界,有正反面的影响。所以这本书本身也具有史料性,成了理解“上海”的一种“症候”,一个“事件”和重要的“时间点”。

虽然有那么多的时间点,我们还是先回到你跟施蛰存先生的接触,那个时候还没有想以现在这个方式来写《上海摩登》;再往回,大概我感觉是1990年代中期,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您的上海经验、对当时上海的判断等等一些因素,慢慢形成这本书的基本立意。

李欧梵:我很想知道反面意见,如果你们不好意思讲,我可以自己先提反面意见。

讲到施先生,他对我的影响怎么说呢?施先生

的小说我们都知道,譬如《将军底头》,夏志清先生的“小说史”里面提到的,但我当时读了以后,觉得施先生的写法不止如此,而且也不像刘呐鸥等新感觉派那样。所以我见到施先生,首先就问他,你对现代主义有什么看法?他说当时不用这个词,我说你编了“现代杂志”不是用“现代”这个词吗?他说你看我用的是法文,是“当代”的意思。我就跟他谈了半天,他提出一个口号,现在变成一个很流行的口号,就是当时他重视是“先锋派”。所以从这里看,我在施先生那里学到,就是他和“现实主义”分歧最大的地方在于他所谓的“先锋派”,一方面是走在时代的前面,另一方面要用一种文字的魔力来创造、展现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和原来的现实是有距离的,而这个“距离”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大有讲究的。为了说明这个“距离”的重要性,施先生当时讲了很多,包括举了西洋绘画的例子,我一开始也不懂,后来听他讲了毕加索,讲了许多艺术批评,讲了更多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我起初以为他关注的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如海明威这样的西方“现代主义”,其实不是,他喜爱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的现代主义,特别是他翻译的施尼茨勒,他是第一位告诉我,欧洲现代主义的真实发源者是施尼茨勒,他至今依然还有影响。当我研究维也纳现代主义时,发现不懂德文不行,所以我学了点德文,至少懂几个字之后我才可以知道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后来施先生的西文藏书散出来了,我买了十几本,里面有的是英文,有的是德文,有的是法文,施先生懂法文,他翻译则大部分从英文书来的,他德文书也买,可是他不大懂德文,鲁迅懂德文。从这儿我发现,原来当时上海的许多作家,都像施先生那样,懂法文,懂英文,显示了当时文学环境的国际性。施先生打开我的眼界,可是我迷迷糊糊只知道问他小说,小说在当时中国也有“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之分,施先生很有趣,我问他的问题,他会反问我你怎么问这个问题。我说你的《魔道》写得最精彩了,他说《魔道》是最受批评的小说,你为什么问这个。我说《魔道》之后的写实主义小说也还不错,恭维了几句,并没有多说。他说现在国内研究我的小说的问题,就是只讲我后期写的那些东西。《魔道》以后,或者说《梅雨之夕》《在巴黎大戏院》之后的小说。我说我不是这么看的,

给学生讲施先生,他们也喜欢我讲《魔道》,这样《魔道》本身就有意义了。

我最近到上海交通大学,就讲了施先生,讲了自己对施先生的了解。施先生在国内是唐诗专家,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可是当时他对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和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但他一生不得志,这方面的抱负以后没有发展出来。我一直想为他写一篇纪念文章,可现在写不出来了,我恨不得当时把他散出的书都买过来,我当时买了十几本,现在都存在苏州大学图书馆。我应该把他看的书都浏览一下,看一下当时现代主义文人都读什么书,这个对我的研究来讲很重要。我对于技巧上的研究好像写得比较少了,大概我还是比较喜欢做文化史研究。现在研究新感觉派是一种时髦,有不少新书出来了,我就说我可以不做。

我讲这些也不知道合不合适,《上海摩登》怎么开头,如何结尾,我们好像在表演一种断代史,他们抓到的时刻与我的时刻不太一样,我是讲将来,你们是讲过去:一个是80年代中,一个是90年代中。没想到我又因为施先生的原因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许我们可以玩这种时间的游戏,现在的历史做法不就是把不同的人摆在一起,放在一个当下的平台来谈论吗?

罗岗,对于《上海摩登》,文尖特别强调有正反两面的影响。李先生这本书在学术上的典范意义,也不是所有人都很赞成的,但应该会承认,后面研究的很多观点都是从这里引申出来。李先生一直说这本书里面有不少错误,也有很多问题没有研究。不过,只要认真读了《上海摩登》就会发现,1990年代之后美国学术界所谓“新文化史”的转向,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带动了上海研究的文化转型,后来者都受惠于这一转型,甚至将“上海摩登”这一命题延续到当代史的研究中,加州伯克莱的叶文心写了《上海繁华》,这本书的名字就像是向你致敬;《上海摩登》讨论启蒙运动的生意和上海印刷现代性的问题,芮哲非的《谷腾堡在上海》专门研究上海的印刷资本主义,刚刚翻译成中文,还有上海的电影院,傅葆石就写了《双城故事》更全面讨论以“上海电影”为核心的都市流行文化……由此可见,后面许多的研究,只是把你提出来的问题加以具体化,或者指出你应该研究而没有

研究的问题——譬如卢汉超写的《霓虹灯外》，论述上海小市民乃至穷人的日常生活，书名就表露了在“上海摩登”影响下的“焦虑”——这些实际上说明了你的研究的典范意义，只不过“典范”不是穷尽了所有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要把你提出来的研究范式进一步推进，不能简单地沿着你的路一直走下去，而是可能要和你辩论，甚至指出你的盲点在什么地方。包括刚才讲到建筑的问题，可能就是你的盲点。我很早以前就带着我的学生们一起读《上海摩登》，为了读懂《上海摩登》，我给大家推荐另外一本书——据我所知，李先生也很喜欢这本书——那就是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休斯克不是文学研究专家，但这本书的重点研究了19世纪末的维也纳现代主义，他的专业是城市史，建筑与城市规划更是这本著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世纪末的维也纳》相比，李先生关注的重点是文化问题，就像《上海摩登》的副标题那样：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1930年代的兴起；休斯克的立场要比你更激进，比你更关注政治。因为19世纪末期的维也纳现代主义和19世纪末期欧洲的政治斗争——既包括资产阶级革命，也涵盖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世纪末的维也纳”必然包括某种“政治”与“文化”的错综。同样，1930年代上海不仅面临着新的都市文化的兴起，也需要面对1920年代末期由于“大革命”失败而转化出来新的政治。因此，怎样把《上海摩登》描绘的图景进一步打开，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叠加到都市文化中去，想必会产生相当惊人的效果。

我觉得，这种新政治不一定要局限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上海武装工人起义等等政治大事件上，“新政治”其实可以有更多的面相，譬如《上海摩登》特别重视“法租界”在上海文化中的作用，从曾朴父子的真善美书店，一直到震旦大学的法文系，包括施先生也一直在这个“法语圈”的脉络。但法租界的这种文化状况和法租界的政治之间是否有某种关系呢？《上海摩登》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上海有一位叫小白的作家，写了一本题为《租界》的小说，这本小说为理解法租界的政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那就是上海法租界的殖民治理，与法国在亚洲的整个殖民体系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譬如上海法租界的警察制度与法国在安南

建立起来的警察体系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小白利用自己强大的语言能力，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再加上小说家的虚构，通过塑造一个原来在安南执勤的法国警官又到上海继续办案，展示出这套复杂、精致同时又可能不接地气的殖民治理和治安体系。将治理方式和文化状态联系起来看，上海的法租界自然也不是完全“去政治化”的。这种“政治”与“文化”的叠加，并非简单地处理“左翼”的问题——尽管左翼问题依然是上海新的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面——而是和之前谈到建筑的问题，再加上法律的问题、治安的问题等等，共同推进“新文化史”的研究，克服这一研究途径有时过于依赖文化，忽略政治的毛病。

李欧梵：幸亏你提醒我了！我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记得多年前在纽约大学演讲，他们也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说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讲穷人。他们说不是，你可以讲布尔乔亚的本身，但讲布尔乔亚可能是“去政治化的”，也可能有“政治性”，这儿有不同的两种趋向。大卫·哈唯研究19世纪的巴黎，整个出发点是布尔乔亚的资本主义，但他自己的立场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我研究上海的“小资”，上海的文化，并不表明我一定赞成这种文化，但我的确没有把文化背后的某一种政治矛盾性带出来，我自己对这种文化的不满意，其实可以在书的结论中表达出来，可惜我当时的功力只能停留在文本的对照和比较上。

日本作家横光利一的《上海》写得非常好，我后来在香港教书时把这本小说和马尔罗的《人的状况》进行比较，仔细研究马尔罗的文本，发现这个作家也了不起，他没有到过上海，但《人的状况》把蒋介石清党时代的上海共产党和共产革命英雄化了，书中对时空细节的掌握，以及人作为城市革命分子感受到的那种虚无性，直接放在欧洲文学传统中。我现在的研究兴趣反而在做平衡式的、世界文学的比较，虽然我对文化有兴趣，但心里还是喜欢文学。从马尔罗的小说可以看出来，与上海同一时期1930年代，全欧洲不得了，全部是左翼的。欧洲从一路数下来，从苏格兰一直到意大利，重要的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都是左翼的。现在看来，“左翼”这个名词需要重新界定，当时“左翼”的力量源泉正是基于都市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的不满，以及对为了克服上述危

机国家迅速法西斯化的抗争。当时左翼的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往往觉得他们的家是世界性的，所以才会发展出也影响到中国的“世界语”运动。我自己最近在香港推动一个小小的研究计划，叫作“左翼国际主义”，就是指这样的一种运动状态。这个运动的中心在莫斯科，当时莫斯科派了很多革命者去发动或支持各国的左翼运动，这些革命者很多都是文化人，与作家也有交往，深懂现代主义，精通几国语言，内心却充满革命的热情。在他们身上，一方面体现的是民族主义的苏联，一方面则表现了左翼的国际主义，两者的结合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上海左翼的那一段没有写进《上海摩登》，有点遗憾。当时太拘泥于新感觉派作家了，其实不应该花这么多笔墨一个一个介绍。我觉得刘呐鸥电影评论写得不错，但小说并不见得那么成功，这个观点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台湾文学研究界认为刘呐鸥似乎是神一样的，什么都好。我说他的软性电影评论比小说写得好得多，小说并不值得太过重视，这个说法引起台湾很多人的不满。仔细来看，我也许应该把我的坐标整个改一下，当然也是受制于当时对某些文化理论的掌握。现在反而觉得可以怎样把它变成一种“另类”的立场，来重新批评殖民主义文化，如果今天都市文化面临全球化的境遇，那么1930年代的都市文化也面临着另一种全球化，由殖民主义带来的全球化。如何比较深入地评判这种殖民主义影响下的都市文化的好坏，我的功力恐怕还做不到，这需要阅读大量的档案资料。我指导过一位香港大学建筑系的女学者，她现在在同济教书。她描述上海的英租界是怎么建造出来的，当时各种势力在较量——英国商人、英国领事馆、清政府、上海的地方势力等等参与到较量过程中——慢慢地争论、斗争、妥协出来了后来租界的模样，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却造就了地标性的建筑。假如拿上海和英国殖民地孟买来比较一下，为什么孟买的建筑模式都是殖民式的，而上海英租界的却不完全是？我当时对这位女学者的论文就只提了一句，没有讲是什么。和英租界不同，法租界更好玩了，进行文化殖民，安南的歌剧院完全是法国式的，咖啡店也完全是法国式，上海法租界的地名也完全法国化了，我想问问各位，思南路这个名字的

来源是什么？我昨天见了一位吴教授，他听说我要来思南公馆参加读书会，马上告诉我思南路的名字来源于法国作曲家马斯南。霞飞路的“霞飞”是一位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路，那就不用多说了，当然是指贝当元帅……可以说上海是进行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风水宝地”，但后殖民主义研究必须真正进入到殖民主义的历史中去，而不是坐在那里用某一种理论批判这个，颠覆那个，需要掌握和阅读大量的材料。

上海英租界和法租界都保存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更不要说上海还有大量的外国游客，很多名人都到过上海，譬如海明威和他的第三任妻子著名的战地记者玛莎·盖尔霍恩来过上海，还有艾米丽·哈恩(Emily·Hahn)，也就是项美丽，嫁给了邵洵美，他们都留下许多关于上海的回忆录，犹太人来到上海避难，也留下了不少相当珍贵的记录，还有白俄、朝鲜人、日本人，都到上海，不少人都记下了他们对上海的观感……当然，掌握这些材料需要比较强的外语的能力。这些外国人眼中的“魔都”上海，是“半殖民”的或者类似“殖民”的情调，还是“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它在殖民主义全球化中代表了一种怎样的都市文化？这种现象和问题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是我太老了，没有精力了，只能请各位年轻朋友继续研究下去，我把球抛给了你们。

三、沪港双城记：夹在世界之间的城市

倪文尖：李先生还是厉害，我们抛球给他，他一下子又抛回给我们，抛得非常精彩！但我先不接这个抛来的球，而是想换个话题。《上海摩登》的结论讨论的是“上海的世界主义”，在这个结论中有一个话题在座朋友们都很关心，我想普通读者也会关心，那就是上海香港的“双城记”。在《上海摩登》刚出版的那个时候，谈香港和上海的“双城记”当然需要顾及当时的语境，但随着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上海和香港的位置都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知道你这几年一直生活、工作在香港，你很喜欢上海，也很喜欢香港，我不会问你更喜欢哪里，而是要问现在假如让你接着《上海摩登》的“世界主义”的视角，再来谈谈香港和上海的“双城记”，你会有一些怎样的新思考？

李欧梵：也许我们可以用文尖这个题目把各位带到当代上海，我很想听听大家对当代上海的看法。我曾经和哈佛大学出版社签了约，要写当代的上海和香港，也许是一本新的“双城记”。结果我只写了一本关于当代香港的书，但这本书在香港没有人看，在美国却有很多人看，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之所以用英文写，则是由于2008年中国北京主办奥运会，许多美国游客去北京看奥运要经过香港，所以哈佛大学出版社说给你五千块美金稿费，让你写一本专门给高级知识分子或有钱人看的香港导游书。我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一次拿过五千美金的稿费，很好，马上写，两个月写出来了，关于香港的导游书，我想中文书名可以叫《我的香港》，英文书名是出版社订的，City Between Worlds，翻译成中文就是“夹在各种世界之间的城市”。我规规矩矩地按照导游书来写，从中环开始走，然后到湾仔，再到铜锣湾，到九龙，最后到新界，每一章都讲这些地方背后的历史；有一章专门讲山顶，我借此批判了香港殖民主义的历史，一直批判到苏丝黄，我想通过导游书的方式对殖民主义文化进行批评，也挺有意思的。

City Between Worlds 大概是2006年到2007年出版的，距离现在又过时了。有一位朋友——作家董启章的太太黄念欣——帮我把这书翻译成中文，可是她太忙了，我也不好意思催她，现在还没有翻译出来，不过即使翻译出来也过时了。不是我的书写得不好，而是书中所写的那些地方正在或已经从香港消失了，譬如书中说从中环地铁站第一号出口出来，一出来就是皇后大戏院，但如今没有皇后大戏院了，整个地方都消失了，本来意义上的“disappear”不只是“消失”的意思，可现在的确变成这个意思。当时的香港正在消失，剩下的是什么呢？草根香港！不是商场，是卖菜的市场，我和我老婆常常去，当年长大的地方，那些市井街市，不是九龙塘，而是像九龙城那样原来“三不管”的地方，这种原来可以抽鸦片的地方也没有了，剩下一个表面上非常漂亮的一个公园也没有什么人去。可是到公园去看看那些石头就会想到——老年人都知道——当时可以去那里看人家怎么拔牙、抽鸦片，整个都市回忆需要依靠最底层的人们来保存和延续，这些人聚集在哪里？在九龙，新移民则在新界。和九龙、新界形成对比的，是中环那一带

聚集了大量的所谓“ABC”亚裔，在美国或欧洲受了教育，回到香港做金融，还有一些世界各地来的外国人——包括美国人——在那里开小店，有点类似上海的地方，不过规模很小，因为整个香港太小了。

香港这个城市变了。如果用建筑来作为回忆的载体，我会问哪一个建筑可以引起我对老香港的记忆呢？几乎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教堂，连原来山顶上总督住的屋子也拆了，全部是新的，新的也好，能给我看一些有特色的、有文化指涉性的建筑吗？很可惜，没有！建筑都是一模一样的，香港两个最大的建筑，一个是国际金融中心(IFC)，还有一个是西九龙将要出现的“环球贸易中心”，两个高高在上的大楼，我看了非常倒胃口，完全是一种金融世界的图腾。香港花了十年时间准备，现在只剩下一个公园而已，就是西九龙的文化区。我认为最好的计划，真的把香港文化潜力带进去的是库哈斯的计划，可惜被否决掉了。现在规划的是一个最无聊的计划，就是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的设计，有人说香港应该叫 Foster Town，从香港机场到汇丰银行，香港的主要建筑都是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在这样的状况下，香港草根文化成了保存集体记忆的里面另一个世界，有时候会爆发出来，虽然爆发的力量不一样，却可能变成香港人最基本的文化认同，变成香港年轻人认同的某种“亚文化”，譬如网上流传的某一种歌曲，某一种流行语，本来使用的是底下阶层的语言，现在却变成了年轻人的网络语言。香港人讲不好英文，牛津口音的英文几乎没有人讲，可以说整个香港都普罗化了。如果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回忆香港的过去，他可能会发现连俱乐部的品位都变低下了。有一次我到香港的一个高级俱乐部参加婚礼，五分钟就忍不住了，那是一个高官儿子的婚礼，我发现那些人全部不学无术，每个人都赚了几千万，每个人英文都不错，但我说什么文学，他们都不懂，我跟他们混干什么？说实话，我在香港高官面前，不管你是什么党，马上架子就摆出来。因为他们太没文化了。

你说香港没有文化？有，确实有！它的文化真的在于那种多元性和复杂性。任何一个你以为你知道的东西，有人会知道的比你更多，就有这样的少数人。我有几个听马勒音乐的同好，是在银行做事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知道的马勒比我多

了很多倍,每个人家里关于马勒的唱片多达几百张,甚至几千张,他们在世界各地订购马勒的音乐。你跟他谈马勒,他会说第六交响曲第二乐章,哪个人哪个版用的什么板,谁用的是慢板,谁用的maestoso(庄严的),都清清楚楚,如数家珍。我时常向他们请教各种各样的怪问题。所以说香港的文化处于极为复杂的、嘈杂的状态,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不可能有一个主题、主体或主旋律,现在大家对主旋律完全没有兴趣,不管是民族主义还是殖民主义。这或许代表香港文化的另外一种意义。

所以我常说香港的弱点正是它的优点,香港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是传统的,华人世界中,只有香港从19世纪一直到现在全部是移民过来,最多是商人,香港文化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商人文化,可香港的商人缺少了譬如扬州盐商的那种文化。我最近到扬州看了很多当时盐商的宅子,很有文化,譬如一个园子里有石涛设计的山水在里面。你难以想象香港商人会追求这种高雅文化。正因为香港好像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文化,成为一个开放的城市,虽然最近闹了很多事,但本来是开放的城市,因为开放,香港的未来没有办法马上确定下来。

我观察上海,不知道观察得对不对,还想听听各位的想法。香港已经承认自己被上海比下去了,香港只有一样上海还没有完全赶上,不过我看很快就会赶上了,那就是股票,不过最近大陆的股票大涨,将来股票大王国还是在上海。香港要比的话,潜力在哪里?除了刚刚讲的草根文化,另外一个令我非常吃惊的是教育,我一天到晚批评香港的教育,可是很多学生都到香港来读书,特别是中国内地的学生,我现在最好的学生都是内地来的。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每个内地学生到了香港都说我不要回去。为什么?不是政治问题,他说回去要帮他们的教授做奴隶式工作,不能发挥自己的学术潜能。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内地教授那里有一大堆项目让他们做,给教授打工。所以香港的教育至少一部分还保留了学术自由和学术自尊,因为大部分香港大学的老师都是从国外来的,像我这种人早该退休了,可还没有退,香港的大学表面上是非常官僚化、程序化的,或许有这些老师在,因而维持了某种对于学术的尊重,师生关系也有种种问题,可是毕竟保留了某种学术空间。

另外,我自己兴趣很广,在香港一上网什么都查到了,不像在内地我昨天查今天查找不到了,要买什么东西随时也可以订到,这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用香港的开放来对照一下当下的上海,可以说上海在挖底蕴,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感觉上是上海市政府花了很大工夫,也许上海的商人特别是地产商比香港的地产商有文化,他们真的做了一些功夫费了一番心思,将来能不能成我不知道。比如说新天地是香港商人带进来的,当时上海人跟在后面,但这次看外滩源,我觉得已经不是了跟着香港人了,朋友带我们到二楼一件古旧的房子,原来是一个台湾人开的店,专门卖“微热山丘”的凤梨酥,完全是第一流的设计,就一张桌子在那里,后现代的风格,黑乎乎地走上去,发现别有洞天,我们喝一杯免费的茶,扬长而去。香港做不到这样,为什么?因为里里外外到处挤满了人。今天我们在外面走,原来法租界的那几条马路没什么人,这太了不起了,上海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怎么没有人呢?这在香港是难以想象的。今天走了几条街道,都是当年法租界的马路,我在路上问,这条马路原来法文名是什么?朋友马上用手机一查,上海人早就研究出来了这条路原来的法文是什么。上海人似乎对于自己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别敏感。不管是商人还是学生,似乎无形之间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也越来越得到学界或者海外的承认了。也许我作为外来人太喜欢上海,也许过誉了,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像外滩源这样的地方,我就相当佩服。也许有人会说,这里太高档了,完全没有人气,都是些名牌商店和高档住宅,旁边还有一个最贵的酒店半岛酒店,也是香港人开的,这不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高级消费空间吗?将来上海是不是就走这一条路呢?我觉得不尽然。因为在不远的地方就有两个老太婆在那里跳舞,上海什么公园什么高档地方都有人在跳大妈舞,也许上海要靠这个来救,这变成上海生命力最重要的也是最强的一点。

一个文化真的要靠一种活生生的生命、集体性的生命,把底蕴慢慢地挖掘出来。我认为最好不要规划,可现在的矛盾在于,不规划不行,城市中这么一大块地不规划怎么办?香港就是政府太无能,完全交给地产商,好了,搞得乱七八糟,地价还那么高。在这个意义上,我反而赞成政府做适度的

规划,但问题是在规划过程中,是不是能够把上海营造成真正有文化意义的国际大都市?这个恐怕很难讲。

罗岗:刚才李先生提到库哈斯的规划,我看他最近有一个批评特别好,说的是现在全世界都在推销“智慧城市”,但库哈斯认为“智慧城市”其实是“愚蠢城市”,因为智慧城市追求的所谓安全和舒适,实际上损害了城市中最重要多样性和丰富性。我感觉上海也有这样的问题,地标性建筑越来越多,但都是高高在上,如你所批评的金融式图腾;其次是上海的消费空间越来越 shopping mall 化,就是香港九龙塘“又一城”的模式,通过轨道交通构建人群集聚的方式来刺激商业发展。李先生特别注意到香港的草根文化或者说庶民文化非常有活力,九龙城我也很喜欢,但九龙城草根文化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没有通地铁,如果轨道交通进去了,九龙城的面貌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恰恰因为它没有“接轨”,反而保留了独特的文化生态。

和香港一样,上海也有所谓“市民文化”,尤其体现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上,说起来这也是《上海摩登》原来应该关注却没有关注的一个领域。虽然这种文化也在慢慢消失,但还是有很强的活力。最近在上海有一本特别火的书叫《繁花》,这本书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很多人都愿意去读它,是因为这本书重写了富有质感的上海市民文化,而且是在对照中进行“重写”:一边是作为现实的九十年代,其实很无聊,就是男男女女,吃吃喝喝;另一边是作为“回忆”的六十年代,那时的上海反而显示出另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无论是城市空间,还是日常生活,都具有一种简单质朴的繁复。一般人肯定认为九十年代的上海要比六十年代的上海更加有趣,但《繁花》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这种状况和上海市民文化的源流密切相关。

倪文尖:我第一次去香港时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就是刚刚李先生讲的香港的草根文化。那时应该是世纪之交,接待我们的香港教授推荐游览的地方就是庙街,说句实话,十五六年前,对于我们来说,庙街有什么可看的?现在回头反思,可能这几年上海的知识分子在观念的层面上越来越像老罗一样,开始意识到上海自身的草根性和市民文化的重要。但上海这些年来快速发展和变化和市民文化自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强势政

府。很多人都研究了上海为什么在最近二三十年有这么大的变化和发展,客观上讲和强势政府的能力——尤其是以区为单位的竞争——非常有关联,具体说是官和商的互动与合作,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的市政能力与国际性已经成为上海个性——不是贬义上的——的一部分。这使得如要像香港讲“草根文化”那样,讲上海市民文化到底是什么,也就变得很困难了。光有艺术还不行,这种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也许刚刚萌芽。我觉得,上海原来是好几块,上只角、下只角之间的断裂很明显,现在加上新移民,又有了新的断裂,这也可能导致最近这些年有一种文化的萌芽或自身的变化。

李欧梵:上海的里弄文化怎么样?不是有很多人研究里弄吗?

罗岗:上海还有里弄,也有里委会,但现在的表述是把“里弄”称为“社区”,“里弄文化建设”就变成了“社区文化建设”,或者更宽泛地把基层社会建设称之为“社区建设”,“社区”变成“基层社会”的代称,但在行政架构上还是保留里委会或居委会。这里面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来自传统,上海因为最初的石库门建筑而形成了里弄的规划;其次则是因为1949年之后居委会的管理叠加在里弄的布局上,而在居委会之上则形成上海基层最重要的管理单位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对整个街道——也可以视为一个大的社区——的规划有非常大的影响。譬如我前段时间参加新江湾街道的规划会议,这个街道包含了复旦大学新江湾校区,也是地铁一个终点站。新江湾街道规划的核心问题是,街道的居民基本上都是新移民,而且社会层次和文化层次比较高,不是像以前静安区的普通居民动迁到新静安城,这就比较强调要打造一个高层次的新江湾文化。由此可见,街道在影响当地文化上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欧梵:香港好像是自动自发,乱七八糟。警察说你不能在这里乱卖东西,卖东西要有一个执照,那个执照是爸爸死了,儿子不能继承,需要重新申请。相比之下,上海的规划性很强,也许就是你们说的市政能力一路下来。

你们说我的书里完全没有市民生活、日常生活的问题,其实也有,因为《上海摩登》研究了张爱玲,张爱玲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写小市民的生

活,从哪个里弄走到什么地方,然后去哪家商店买东西,哪家餐馆吃饭约会。所谓“怀旧”不就是“怀”这些地方的“旧”吗?一个都市文化不只是几个建筑而已,建筑可以带动的空间不一样。《上海摩登》确实里弄文化写得太多,没有搞清上海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书里写的基本上是作家,我脑子里想的全是新感觉派,没有进入到社会空间的层面。现在不同了,文化地理学很兴盛,是一门显学。很自然让人关心这类问题。

我举一个怪例子吧,当年得过诺贝尔奖的埃及作家马哈福兹,他写的小说就讲街道,他每天在那里吃早点喝咖啡,他就写这个,得了诺贝尔奖。他的书也成了文化研究很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市民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香港底下阶层的日常生活同样非常精彩,你愿意去买菜就能在菜场体会到这样的生活,我陪我老婆买菜,她嫌我太慢,就让我坐在那里,我就听周围的老头老太太讲话,他们早上把麦当劳和星巴克都“占领”了,礼拜六快餐店咖啡馆都坐得满满的,他们也不管,一上午泡在那里,老头老太太要找聊天的地方,香港没有地方聊天,就跑到那里去了。更不要说茶餐厅,人满为患,看香港电影就知道那种状况了。上海有没有港式的茶餐厅?香港到处都是茶餐厅,所以到处都弥散着茶餐厅的那种味道,香港是一个有味道的城市,你闻着那个味道就感受到乡愁。我还不完全是个香港人,只能算半个香港人,但很喜欢鱼蛋面,特别是鱼蛋那个味道,这就是香港的味道。上海也有上海的味道,我这次来上海还没有感觉到。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我感受到了,我跑到以前的大世界附近去吃面条,上海面条加上白斩鸡,还没有到那里,就已经闻到那种味道,这就是上海的味道。

欧洲的城市也有这样的味道。譬如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我最佩服巴塞罗那的地方,就是它的街市,卖菜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吃到最好的巴塞罗那的菜,便宜得不得了,坐在那个小店里面,我本来不喜欢吃海味的,但到哪里每餐都能吃完,我老婆可以作证。这个城市的文化不得了,到了书店一看,所有的书都是两种语言摆在那里,欧洲的理论大师的著作,一个一个放在那里,也是两种语言的版本,确实惊人。这样的城市文化才真是了不起:一方面是非常国际性的、思想性的文化;另一方面则是真正的草根生活。两个方面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提升,现在要说吃的话,听说世界十大名菜餐馆,西班牙占了一半,最贵的菜要200欧,我们没有去,老实讲太贵了,后来在一个小乡村里,我们吃了50欧一份菜的餐馆,从下午1点半吃到5点,真是精彩,各种装菜的碟子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饮食文化同样代表了一种城市的文化。

我心目中的上海,确实有很多都没有写进《上海摩登》。当时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不少,包括王安忆的作品及其他人的作品。《繁花》我刚刚开始看,开头也是在街市上,老板娘说什么,老板说我晚上怎么样……从菜市场开头,我觉得这本小说很好,当然还没有看完,不能完全下判断,可我也听到了反面意见,在杭州就有人表示不喜欢《繁花》,他们说上海人太喜欢那种腔调别人却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杭州也有杭州的味道,他们不一定喜欢《繁花》中上海的味道,这也很正常。

(作者单位:香港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张涛)